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 号 E5.1.5

总 章 号 ZL11847

纪念聂耳诞辰七十周年文集



新乐风丛书之一

纪念聂耳诞辰七十周年文集

(1912—1982)



聂耳、冼星海学会

一九八二年八月·武汉

100





朱德同志1964年为昆明聂耳纪念馆题词



《义勇军进行曲》手稿

编 者 的 话

为了纪念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音乐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驱者聂耳诞辰七十周年，我们编选了这一本《纪念文集》。文集中的文章，除一部份是经我们组织的外，大都是选自各地今年报刊上所发表的。

文章的作者大多是音乐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们以对革命先辈崇敬缅怀的深切感情，在文章中阐明了聂耳同志在人民音乐运动史上的伟大功绩，并阐明了在今天继承聂耳所开创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道路、发扬聂耳的光荣传统的巨大现实意义。

此外，《纪念文集》中还有聂耳生前的战友和他的亲属，以及从事聂耳研究的同志所写的回忆录、生平略传和有关聂耳创作歌曲的学术研究论文。这些文章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革命音乐家的历史和革命战斗历程，为同志们在学习研究聂耳的创作道路、创作方法、创作思想、创作风格，发展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事业方面，提供了参考意见。

这是一本内部发行文集。由于时间较短，我们掌握的资料也不多，限于水平，在编辑过程中难免有遗漏和不当之处，希望得到指正。今后我们还将继续编印聂耳和星海的资料，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 录

聂耳像

朱德题词《人民的音乐家》

《义勇军进行曲》手稿

纪念文

“我是为社会而生的”	吕骥(1)
回忆三十年代的聂耳	贺绿汀(12)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者的道路	周巍峙(14)
从聂耳的功绩谈起	李凌(21)
继承发扬聂耳革命音乐的战斗传统	孙慎(29)
继承聂耳的光荣传统，学习聂耳的战斗精神	程云(38)
云南省《聂耳音乐周》开幕词	王甸(44)
高举聂耳的旗帜，前进(《聂耳音乐周》开幕式上的讲话)	赵汎(48)
给云南省音乐工作者的一封信	李坚(50)
继承新音乐运动的革命传统	陆万美(52)
学聂耳精神，走聂耳道路	张维(56)
伟大的起点 正确的方向	李佺民(59)
要像聂耳一样抒爱国之情	张权(62)
继承和发扬革命的音乐传统	王莘(64)
循着革命音乐家的道路前进	陈沂(68)
在聂耳开辟的道路上前进	瞿维(70)
开路先锋聂耳	王云阶(73)
纪念聂耳七十诞辰	刘良模(75)

- 象聂耳那样关心儿童..... 寄明 (77)
 走聂耳之路，创新乐风..... 林路 (79)
 大众都爱你的新声..... 常苏民 (82)
 纪念聂耳，学习聂耳，振兴中华，造福人民..... 丁鸣 (85)
 继承发扬聂耳的革命传统 创作出代表我们时代最
 美的音乐..... 朱之谦 (92)
 黄浦江边的联想..... 韩刚觉 (95)
 沿着聂耳的创作道路前进..... 沙青 (99)
 走聂耳的路，唱四化的歌..... 储声虹 (103)
 继承和发扬聂耳的革命音乐传统..... 平静 (109)
 在聂耳故乡..... 程茹辛 (113)
 推动群众音乐生活的健康发展..... 李爱华 (116)
 纪念聂耳 学习聂耳..... 马桦 (118)

《诗歌》

- 聂耳墓前..... 光未然 (120)
 葵聂耳墓..... 朱绛 (122)
 聂耳七秩诞辰感怀..... 储祖怡 (123)
 聂耳的歌(歌曲)..... 管平杨 素 (124)
 报春光(歌曲)..... 张锐 (126)

中日友谊篇

- 《写在聂耳纪念碑重建之时》..... 中島健藏 (128)
 聂耳和我..... 叶山峻 (130)

回忆录

- 纪念声中忆亲人..... 范子明 范叔伦 (133)

我的回忆	李同生	(136)
聂耳亭	张 械	(138)
有意义的欢迎晚会	聂叙伦	(140)
聂耳与玉溪	崎 松	(142)
忆聂耳	许幸之	(144)
聂耳的青春活力	吴永刚	(151)
给聂耳拍照	周伯勋	(153)
卖报姑娘与码头工人	周伯勋	(155)
聂耳同靡靡之音的斗争	周伯勋	(159)
聂耳学琴	王人艺	(161)
洱水谱出《大路歌》	云南博物馆	(163)
“卖报小行家”忆聂耳	周玉明	(165)
聂耳在北京	陆万美	(167)
聂耳纪念碑	蒋孔阳	(182)
聂耳是日本人民喜爱的音乐家	聂叙伦	(185)
聂耳在日本	韩刚觉	(188)
中国抗战歌曲在美国	刘良模	(204)

【音乐专论】

聂耳歌曲的艺术特色	践 耳	(206)
革命歌曲大师——聂耳	竹 风 唐远如	(218)
迎着暴风雨翱翔的海燕——聂耳略传	向延生	(237)
各地纪念聂耳诞生七十周年活动图片	中国音乐研究所、新华通讯社、总政歌剧团、音协宁夏、吉林分会、杨克、李家琪、周炳林供稿	

“我是为社会而生的”

为纪念聂耳同志诞辰七十周年而作

吕 骥

聂耳同志生于1912年，假如现在还在世的话，也不过70岁。可惜他逝世已经40年了，逝世时才不过23岁。依现在的情况，23岁的青年大学刚刚毕业。聂耳同志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高师（相当于高中）毕业后，就开始自谋生活，在工作之余，自学音乐。然而他在音乐方面的贡献，却远远超过一般受过高等音乐教育的人。

我们说聂耳的贡献超过一般受过高等音乐教育的人，不是指他的作品数量，也不是指作品的某些艺术技巧，而是指作品所起的教育作用和作品的社会影响，以及他的作品的创作方法在音乐上所开辟的道路而言。

如果不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我们就不能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一个业余自学的音乐青年竟能超过高等音乐学校毕业学生，这岂不是不能令人相信的神话吗？然而铁一般的事摆在我面前，是不容置疑的。聂耳所写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铁蹄下的歌女》、《新女性》、《前进歌》等歌曲在很短的时期内，迅速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流行于大江南北，首先是由于他的

歌曲作为时代的战歌，揭露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唱出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鼓舞起群众抗日救亡的斗争意志，使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的群众情绪沸腾起来，给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妥协投降政策以沉重的打击。正是由于他的歌曲的流行，阻止了靡靡之音《桃花江》、《妹妹我爱你》的泛滥，缩小了资本主义金元帝国的电影歌曲《大军进行曲》、《花生米》的市场。使得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欧洲艺术歌曲中的一些爱情歌曲《小夜曲》、《我的太阳》、《鸽子》黯然失色。使同时代的电影歌曲《天伦》、《姊妹花》、《芭蕉叶上诗》中的主题歌显然失去了魅力。更有意思的是电影《凯歌》中的《打长江》几乎不为人所知，但聂耳用同一首词谱写的《打长江》却流行于群众中，而这样一些作品却不是出自受过高等音乐教育的作曲家之手，而是出自一个业余学习音乐的青年之手。这岂不是历史事实么？

要理解这个问题并不难，我们只要不怀成见，客观地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当时农村经济日益破产，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日益受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各阶层人民都迫切要求团结御侮，以求得生存。聂耳为进步电影所作的歌曲和电影本身一样，是顺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聂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历史的必然。聂耳的作品完全不是什么天才的创造，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培育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艺术影响下而形成的产物。

从他的整个生活历程来看，他考入初中，正是国共合作，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从15岁开始（1927）读马克思的论著，16岁（1928）参加共青团，1930年到上海不久，参加了反帝大同盟、苏联之友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读《反杜林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感到潜心学欧洲古典音乐

不切合时代需要。8月去北平前在上海已参加了左翼剧联，抵北平后即参加北平左翼剧联的工作。同年11月，回上海后，仍参加上海左翼剧联工作；1934年1月前后田汉同志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据于伶提供材料）；1934年2月接受党的指示，决定不去江西国民党“复兴社”控制的“怒潮剧社”乐队，留上海左翼剧联工作。

从思想发展过程来看，聂耳也完全是在党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从他自己的日记书信以及别人的回忆所能看到的资料都说明，他于1927年一进入省师高级部（相当于高中师范科）以前，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看进步文艺书刊，这年的寒假，他在家开始读马克思著作，到1928年下半年被批准加入共青团以后，就在团的领导下，学习《共产主义ABC》；1929年5月23日和24日的日记作了读马克思著作的笔记：“唯物史观，经济条件绝对律：人类意志的决定，是绝对受经济条件之支配。马克思说：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法的变动为一切制度变动的标准。”“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要有阶级斗争，社会才有进步，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原动力。”“马克思说：资本家所得的利益是剥夺劳动者的过剩劳动力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说：资本集中是资本主义自己造坟墓。”

1930年下半年到了上海，读革命文艺刊物《拓荒者》，在10月或11月的日记中有这样记载：“看了几篇革命文学论文，指示给我现在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今后我的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针将改变了，不再作个人的呻吟或以个人的革命性的表现去影响群众。微小的力量不能说没有，但总不如更深一层的往前跑，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

聂耳同志非常注意思想理论的学习，1931年8月16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不论你从那条路跑，你对于哲学的基础不稳

定，终于是难走通的。假使你要是无目的去混混，那当然不在此例。”“新的脑子的培养，不是用一个模型一套便一次铸成，永不会腐破的，它正如一颗嫩小的植物，随时需要合理的灌溉，……所以新的脑头要随时装入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道上发达。……脑筋若无正确的思想的培养，……那末一切的行为都没有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我已经是一度受过充分的培养而现在遭饥荒了，由这种饥荒的结果，影响到生活没有中心思想，常常被感情支配着一些应以理智判断的事，这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大约一个多月后，他开始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本哲学著作。（9月29日日记）这年年底他提出了下年的工作学习计划，第一条就是多看英文书和社会科学书籍。1933年2月2日日记中记了“回家阅《马克思传》，趣味很浓”。以后，他的日记中虽未完全记载他读过些什么书，但从他所记载的书名来看，他已开始注意读写作方面的著作，1933年4月22日买了《写给青年创作家》、《文学术语辞典》，4月23日有“把袋里装着的《创作与生活》拿出来看好多页。”的话，前一天还摘录了“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这样的话来提醒自己。1934年可能因为工作学习很紧张，日记只有三篇，最后一篇似乎是概括性的、八、九个月的主要工作和参加音乐活动的简记。1935年出国前记得更简略。到日本后记得比较经常，有时虽比较简略，但很具体，7月7日的日记中，在旅行期内预计要读的书目有山根银二译自德文的《音乐社会学》（作者是马克斯·魏伯）。7月14日的日记计划了以后工作和学习的主要内容，其中有这样的话：“读书的时间有的是！”7月16日的日记除了总结了第一个三月计划的收获之外，对新计划的中心内容特别提出：随时不忘的是“读书！”、“拉琴！”可见他在逝世之前一直注意阅读、加强思想理论方面的学习。

聂耳同志的理论学习是密切联系实际的。16、7岁他还在学校

学习时，就已经对社会问题有所注意，对于罢工、金融等资本主义社会问题都能发表自己经过观察、考虑的意见，当然，这些意见还不是有系统的分析，但已表明了他的思想倾向，说明革命理论已经对他的思想发生了影响。离开学校以后，走进社会，观察了复杂的社会现象、人和人的关系，虽曾有过彷徨近乎消极的情绪，由于环境的变化很快就克服了，终于20岁（1932）在给他母亲的信中，为了回答他母亲向他提出的婚姻问题，明确地写了“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这信中的话，确定了自己生活的目标。1931年4月，他加入“明月歌舞团”后，一直到1932年8月间离开，他对这个团始终在观察，不满意团的工作，越到后来越觉得不对，终于在1932年的7月间写成《中国歌舞短论》用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于《电影艺术》，开始可能为了想保持在“明月歌舞团”拉小提琴的职业，不想公开和该团分裂，后来事态的发展，已无挽回的余地，就坦率地向团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承认了自己就是黑天使，并且和他们当面谈了一些问题。承认文章中有某些缺点后，情况并未改变，才决定离团去北平。这篇短论比较客观，但观点非常鲜明，它所批评的不只是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而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低级歌舞。他对黎锦晖并没有全部否定，一笔抹杀，对他的《小小画家》、《可怜的秋香》、《夜花园里》、《小利达之死》这些作品的某些积极意义，明确肯定了，而且对于他创办歌舞团体、创建歌舞艺术的劳绩，也作了肯定。因此，对于作为歌舞的鼻祖和歌舞本身并未绝望，他认为还有发展的余地，只是面对尖锐的阶级压迫应该深入的揭发，应该寻求更能揭示阶级矛盾的题材，创作健康的新的歌舞艺术，不要为歌舞而歌舞。文章中说“黎锦晖的作品当中，并非全是一塌糊涂：有的却带有反封建的元素，也有的描写出片面的贫富阶级悬殊；……”“所以，我之对于歌舞

和那鼻祖，还有着一线的希望之路。”“你想，资本家住在高楼下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你不听见在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在你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只对某些低级歌舞的批评，实际上这是两个阶级的文艺思想斗争在歌舞领域的交锋，对于聂耳来说，也可认为是为他后来的艺术实践打下的坚实的思想基础。因为在这篇文章的前后，他写过一些有一定思想性的电影音乐的评论文章，不过都没有集中地深入地涉及到创作方向的论述。而他后来两年多时间内的歌曲创作，可以说正是朝着《短论》所提出的新的路向前进的开始。不幸的是，当他准备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离开了我们，使得他不能够在更广阔的音乐领域中为人民作出更加光辉的贡献。这是我国音乐上的巨大损失，尤其是我国革命音乐上的重大损失。

这篇短论的观点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他偶然想出来的么？不是。是革命文艺理论对他的影响，是现实生活中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促使他从纯艺术的追求到为大众的艺术观点形成的集中反映。

1932年1月8日的日记记载了他读了郑导乐（沙梅）、谢韵心（章泯）主编的《戏剧与音乐》（1931年创刊的革命文艺杂志）后，对其中《音乐短论》（夏蔓蒂著、郑导乐译）一文作了详细摘记。日记中说，读了“觉着很满意，它是站在大众化立场谈话的。着实，现在我必须要这个来指导一下对音乐正当的出路，不然，自己想着有时的思想居然和社会、时代冲突起来，这是多么危险的呵！”

“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上海，十九路军抗击日军，他目睹这次事件的发生和结束，亲自看到日军轰炸、炮击、

枪杀，战火下人民家室财产被毁，全家有的散失，有的扶老携幼逃亡。1月31日的日记中记了他看到避难者的情况后，“心里更难过起来。”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整个的世界已经在开始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伊始，到现在已经是无可隐蔽的事实。我的出路问题在这时候也好象随之动摇起来，所谓研究艺术，似乎不会给你长远继续的可能，因了社会环境的决定，常常感到障碍和刺激，况且现在自己所重视的Classic music（古典音乐）是多么反革命的呵！”2月7日的日记有这样一段话，“所谓Classic不是有闲阶级的玩意儿么？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练习，几年、几十年成为一个小提琴家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Sonata能够兴奋起、可以起鼓动劳苦群众的情绪么？不对，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你从前是怎样一个思想？现在居然如此之反动！”这时候，他处在矛盾中，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可能有更深刻的分析，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也还只有一些较简单的理解，他还缺乏足够的艺术实践经验，所以这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整天的在想，终没有想到一个具体的计划。这只有在几个月以后，在明月歌舞团经过去汉口演出，亲自看到一些节目观众不欢迎甚至要求退票，报纸上的批评，文艺界的忠告信，进一步看到“明月歌舞团”演出的失败，才促成他在7月间，写出了《中国歌舞短论》这篇代表了人民群众意见、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批评文章，明确提出要深入被压迫的工农群众，创作为被压迫群众的大众艺术，鼓舞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新的艺术，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那就是建立在革命现实主义基础上的革命艺术，为工农群众的现实主义艺术。那就是站在革命的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分析社会现实，帮助群众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获得正确的理解，给参加斗争的群众以鼓舞，坚定他们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

可能有人说，不错，你所说的革命现实主义艺术，只有文学、戏剧、电影才能达到，音乐是不可能的，因为音乐不可能分析社会现实，更不可能帮助群众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获得正确理解，顶多能够给群众以鼓舞，而坚定他们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也未必能做到。

对。这正是下面所要研究的问题。

我们说聂耳的歌曲创作是革命现实主义的，这包含两重意思，首先他的歌曲的词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然后才是对他的音乐讲的。正如夏衍同志去年在一次会上说到聂耳的歌曲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田汉，就没有聂耳。”这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田汉的词，就不可能产生聂耳的歌曲，因此也就没有了今天我们所纪念的聂耳。从歌词对于歌曲的重要性来说，这句话完全正确。但这句话只说明了一方面的情况；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聂耳，今天就可能不知道作为词作者的田汉。因为《义勇军进行曲》之被选定为国歌，应该承认，聂耳的音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不是这首歌曲从三十年代起就流传在全国群众之中，鼓舞着全国人民参加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全国解放，又怎么可能被选定为国歌呢？

这首歌，不仅被全国人民肯定了是代表我们国家的歌，还在全国解放之前，1944年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在联合国胜利之日演奏的各国音乐中，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就被选定为代表中国的音乐（见1944年7月17日云南省《正义报》“大干”副刊），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也选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对华广播的前奏曲。

（同上）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请大家先读读词作者田汉同志的话：“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